

博格尤特·巴克布、杰斯明·拉赫曼

重构增长

西班牙马德里附近托莱多省的闲置公寓大楼。

为刺激增长，
欧元区必须将
积极的体制改
革与拉动需求
政策相结合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早就明白，欧盟经济亟需从根本上进行体制改革。意识到欧洲落后于美国，欧盟于2000年推出了“里斯本战略”，以期到2010年之前，让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体，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从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早在当前危机到来之前，时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让-克洛德·特里谢就写过：“欧洲改革的四大首要任务就是提供就业、增强竞争力、释放商业潜力以及建设一个创新的环境。”（OECD，2005年）

事实确实如此，根据我们的研究，产品和劳务市场改革带来的长期收益是巨大的，并且会给提高欧洲增长潜力提供一个极为需要的机遇。此外，同时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推动改革能够引发国家间的积极溢出效应。

正在肆虐的欧元区危机突出了改革的重要性，但也增加了实现改革的复杂程度。在没有独立汇率的情况下，当需要给个别国家提供相

对的价格调整时，体制改革必须先进行。但是改革往往要假以时日才见成效，而增长的需求却要求立竿见影。因此，为立刻实现增长和就业机会，就必须将长期性的体制变革与维持需求的短期措施相结合。为了不使这些努力付之东流，也为了恢复货币联盟的生存信心，欧元区必须走向更加彻底的联合。

不管是在欧洲的核心还是在个别国家的层面上，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采取了空前行动来应对这场危机。解决问题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但是需要将其进一步实施。

问题因何而起？

造成欧元区某些国家经济停滞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采用统一货币后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严重失衡；二是竞争缺乏带来的缺陷，特别是在劳动力方面，自从启用货币联盟后，这种缺陷由于南部国家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更加凸显。

劳动力市场中的招工难、解聘难、最低工资标准过高、集体工资

谈判以及特定市场的限制性准入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要提高增长率，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解决好失衡与竞争力缺乏这两大问题。

过去十年间，欧元区国家在追求增长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北部欧元区国家，例如德国和荷兰，是以出口拉动增长；而南部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则是依赖于内需拉动。我们毫不惊讶，北部和南部这两个实际存在的次区域在经常账户收支和相对价格（包括名义工资在内）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进步。南部国家的需求确保大多通过向北部国家借款来筹措资金。南部国家的经常账户存在巨额赤字，而北部国家就持有盈余。

一旦危机爆发，南部国家就要遭受双重打击：随着私人资本流动和信贷的增速放缓，它们不得不开始减少其累积的不平衡；同时，市场开始区分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抬高赤字国家的私人 and 公共部门的借贷成本。

南部欧元区国家的新就业机会会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周期性部门，如房地产。这些部门随着经济繁荣带来的信贷快速增长风潮而迅速崛起。

随着信贷的枯竭以及经济的繁荣让位于深度的经济衰退，南部欧元区国家的失业率出现飙升。欧元区大相径庭的增长策略使南部国家陷入了大规模的失衡，背上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并且正常调整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国家扭转了一些失衡以及竞争差距，但是其进步大都通过劳务输出而取得。它们要做的是，对相对价格作出更多的调整。失业率程度之高仍然前所未有，市场准入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所以经济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见图1）。

这些都不仅仅是短期问题：它们是欧元区长期发展的根本性障碍。例如，意大利的能源价格在欧洲属于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反映了其有限的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而在西班牙，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发展潜力，而且还能够加快就业的复苏。

这些体制性的缺陷阻碍了欧元区在过去的30年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并驾齐驱，即使欧盟的发展较具有包容性。欧元区增长的下滑趋势反映了其大部分地区在生产率负增长的现状，南部国家更是如此。此外，较低的劳动力利用率（或有效生产时间）——许多欧洲经济体的一个体制性因素——能够解释欧元区和美国在人均GDP上的诸多差异。

深层改革会带来变化吗？

欧元区的很多基本问题在本质上属于根本性问题，

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体制改革——用以纠正经济的某些基本特性带来的长久性积累问题的措施。

举例来说，一些关于欧洲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强有力的就业保护、丰厚的长期失业津贴和有益于提高就业薪水的集体谈判制度降低了生产力，继而使增长速度持续低迷。要想让雇主们对招聘负起责任，就必须在控制最低工资标准、分散集体谈判、逐步放开

要提高增长率，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解决好失衡与竞争力缺乏两大问题。

封闭职业、放宽职业保护以及增加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的某些体制方面做出改变。这些措施与包括降低利率或平衡预算等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同的。

经验证明，降低竞争壁垒、提高商业环境等产品市场改革可以大幅提高增长率；而劳动力市场改革除了能够从长期推动增长和就业之外，通过在招聘和解雇方面给予雇主更多的灵活性以及控制工资增长幅度，还能够有助于价格调整，帮助国家恢复部分已经丧失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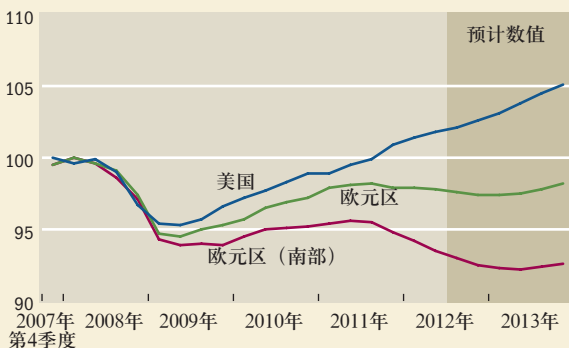
控制名义工资、利用税收来调整消费与劳动力之间的相对价格——这在技术上称之为“财政贬值”——能够加速再平衡的过程。跨部门的再分配可以通过在欧美核心国家层面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来支持，包括定向投资和对欧盟境内的资金资源进行杠杆调节。

欧洲的经验表明，体制改革能够产生强烈的回报（见专栏1），并且许多实证研究指向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对生产力、增长速度和就业的长期积极影响。

图1
扩大的差距

欧洲尤其是其南部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会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重大分歧。

（实际GDP指数，峰值=100）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为了对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进行比较，我们用IMF的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GIMF，见专栏2）对个别体制改革的输出效果进行模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确定了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以及养老金政策的最佳做法。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欧元区国家做出改变弥补其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政策与OECD的最佳做法之间的50%的差距，GDP每5年就会平均上升1.5%；如果同时推进产品市场改革，收益还会增加2.25%（见图2）。

其他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OECD发现，全面且具有魄力的改革在10年内将会使大多数欧元区

国家的GDP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OECD，2012年）。

这些潜在收益是巨大的，但实现它们所需的努力同样巨大，并且短期回报很少，特别是产品市场改革，它需要时间来落实实施。由于产品市场比劳动力市场更加落后于最佳做法，所以，在该领域集中进行改革似乎会产生更高的回报。

我们的模拟结果同样指出，大范围的改革能带来非常大的相互加强效应。例如，一个仅采取措施缩小其劳动市场差距的国家，所获得的增长将会小于一个同时还致力于缩小产品市场差距的国家。

另外，主要通过加强贸易和提高生产力溢出，一个国家的改革也能帮助其他国家，西班牙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增长产生积极效应。总体来说，分析表明，南部国家从北部国家的改革中的获益程度高于后者从前者的改革中所获得的利益，这是因为，北部欧元区国家拥有更大的经济体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但在当前的经济衰退时期，改革不可能给短期行为提供充分的推动力。在经济衰退时期实施改革或许比在经济形势好时更难。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等体制改革针对的是提高竞争和生产力，从而加强一个国家的供应，如果总需求疲软并且产能过剩，在短期内也可能毫无回报。

例如，采取就业保护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刺激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却可能增加失业，因为雇主们可以不用受到处罚就解聘过剩的工人。同样，减少失业保险或提高退休年龄可能会削减那些被迫去找工作而并未找到的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但是，这些变化对于恢复趋势增长至关重要。

专栏1

改革的回报

20世纪80年代的荷兰和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给我们提供了改革能够扭转经济发展颓势的例证。

改革之前，这两个国家经历了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发展，当经济的低迷因大衰退（荷兰，1980—1982年）或银行危机（瑞典，1990—1992年）而进一步加剧时，两个国家对政策作出了一些改变。在10年间，它们实行了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供给方面的变革。其公共支出占GDP比率显著下降，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税收也随之减少；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工作的积极性增加；产品市场的改革提高了竞争力。瑞典在20年里经历了快速增长，荷兰也因其就业神话而闻名于世界。

这些经验对于其国家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一，改革因国家而异。荷兰的改革聚焦于提高其低迷的就业率（工资增长过快的结果）；而在瑞典，改革的重点则在于刺激其低迷不前的生产率增长（受过时的产业与过度的监管所拖累）。在瑞典，由于货币贬值，该国对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大幅向下调整，这对瑞典经济的重新启动起到了助力作用。尽管如此，两个国家的改革依然存在相同点——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高竞争力以及改变激励机制。

第二，改革需要随时间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瓶颈期。荷兰最初的问题是劳动力需求不足，所以政策均集中在降低工资成本上；随着工作岗位的增加，改革转向刺激劳动力供应。

第三，改革的全面效果随时间而增强。

专栏2

模型

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GIMF）是一个广泛使用于IMF内部和一小部分中央银行的通用均衡模型，主要用来分析一些国家的政策和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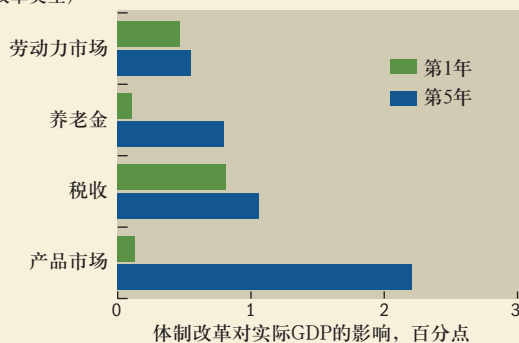
GIMF的传统优势就在于它能有效进行财政政策分析和宏观金融联系研究。

图2

让改变发生

如果欧元区国家能够实行与OECD的最佳做法相匹配的改革，其GDP就会大幅上升。

（改革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IMF的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的计算结果。

政策选项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要应对低迷的趋势增长背景和一些国家的竞争力问题以及为削减非可持续性债务和巨额赤字以满足巩固财政的需求，欧元区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但在南部国家，试图按照建立在活跃的国内需求基础的危机前模式来走出危机，只能是一个幻想。已经证实，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

首先，体制改革应该尽快实施，因为改革成果不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国家，尤其是南部国家，在几年前就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但在现实和可能的增长最大化标准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巴克布（Barkbu）、拉赫曼（Rahman）和巴尔德斯（Valdes）对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了讨论，并为所有欧元区国家提出了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改革重点。

在南部欧元区国家，体制政策必须提升贸易商品的生产效率以帮助其恢复竞争力；在其他国家，政策应当打开服务部门的商业机遇，促进潜在增长。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应当根据国家情况执行，南部国家应该对相对价格进行调整，而北部国家则应当提高劳动参与率。

其次，为避免难以逆转的过度严重收缩，这些改革必须辅以能在短期内增加总需求的政策。这不是简单的财政刺激建议，而是消解改革执行中种种阻碍因素的方式。这和市场压力严重处的快速财政巩固措施以及其他地方的逐步巩固措施一致，允许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并且也考虑到使调整尽量有益于增长。

如果相对价格得到进一步调整，欧洲境内减少不

平衡度会降低对经济活动的破坏性。

自从货币联盟启动，南部欧元区国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的更多的快速上涨又使其失去了竞争力。尽管部分竞争力差距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了扭转，但是要把额外的外部需求引导向南部国家并且保全统一的货币，还需要更多的竞争力。

南欧的价格上涨速度必须慢于北部国家，这就要求南部国家抑制名义工资，而北部国家要让工资与生产力保持一致（见图3）。

再次，欧元区要毫不犹豫地走向更彻底的联合（见IMF，2012年）。最近的政策进步已经缓解了危机，在此基础之上的建设需要欧洲兑现其已经做出的承诺：建立更多的泛欧洲支持政策，修补已经破损的货币传导机制。

在2012年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达成的关于银行联盟的第一要件，即一个独立的监管框架，必须得到实施，并且要辅之以一个覆盖全欧元区的存款保险计划和拥有充分的统一保障系统的银行解决机制。

为了减少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波及到整个欧元区的趋势，银行联盟需要更强大的财政一体化，也就是将更加强劲的中央治理与更多地风险共担结合起来。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国家在纠正以往错误的过程中，不管是如何明智的策略，其当前的表现都难免不尽如人意。该地区必须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修补，并减少过度借贷，因为这会给经济活动带来短期的消极影响。银行去杠杆化——危机前信贷繁荣期的一个必要退绕——更高的私有部门存款和旨在减少债务和赤字的不可避免的财政巩固措施将仍然是妨碍增长的强劲逆风。

结合刺激增长，修补竞争力差距的体制性与选择性需求政策，政策制定者们建立一个更加坚固的联盟的承诺将会提升信心并且支持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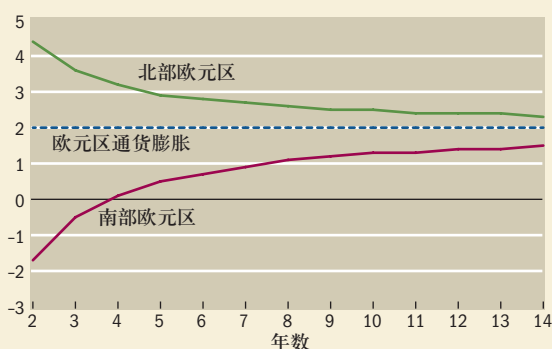
博格尤特·巴克布（Bergljot Barkbu）和杰斯明·拉赫曼（Jesmin Rahman）均为IMF欧洲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图3

扭转差异

为了改变失衡状态，北部国家必须提高通货膨胀，而南部国家则需要降低通货膨胀，从而把前者的需求引向后者。

（北部和南部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的信息公告系统；作者的计算。

注：图中为通货膨胀率（与2%的欧元区平均值一致）与自1998年以来需要弥补实际有效效率汇率累计差距的年数的组合。

参考文献：

Barkbu, Bergljot, Jesmin Rahman, Rodrigo Valdés, and a staff team, 2012, "Fostering Growth in Europe Now,"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2/0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2, Euro Area Policies: 2012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IMF Country Report 12/181 (Washington).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5, OECD Observer (Paris).

———, 2012, OECD Economic Surveys: Euro Area (Paris).